

古文字研究

胡厚宣

子	中	田	井	十	隹
不	長	子	白	=	三
不	田	迷	大	成	四
伐	戰	即	示	成	初
用	曆	井	母	成	吉
賡	習	白	成	王	一
止	對	丁	王	成	可
博	對	補	成	豐	成
濟	天	不	成	即	王



古文字研究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

第十三辑

中华书局



古 文 字 研 究

(第十三辑)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合编

中华书局编辑部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胶 印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1/16·30 1/4 印张 插页 1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册

统一书号: 9018·206 定价: 9 元

目錄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五屆年會開幕辭（胡厚宣）	一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五屆年會紀要（大會秘書處）	三
《殷契粹編》校讀（節錄）（姚孝遂）	一〇
無名組卜辭中父丁稱謂研究（林 澧）	二五
武乙文丁卜辭補證（林小安）	四〇
非王卜辭研究（彭裕商）	五七
商代職官研究（張亞初）	八二
中國正史之淵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貫正確？（美·吉德禕）	一二七
早期商周關係及其對武丁以後商王室勢力範圍的意義（美·夏含夷）	一二九
怎樣認識甲骨文文字（伍仕謙）	一四四
試釋周原卜辭中的出字（徐錫臺）	一五七
讀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刻辭（連劭名）	一六
大玉簋蓋跋——評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張政烺）	一七四
班簋續考（李學勤）	一八一
晉姜鼎銘新釋（陳連慶）	一八九

目 錄

一

長白孟銘文匯釋（孫稚鏞）	二〇二
乙卯尊銘文通釋譯論（王慎行 王漢珍）	二〇九
輔師簋蓋三考及斷代（唐復年）	二二七
湖北出土兩周金文國別年代考述（劉彬徽）	二三九
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李 零）	三三三
再談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與西周銅器斷代——讀《西周金文和周歷的研究》後記（劉啟益）	三九九
「帝司」與「司母」小考（尹盛平）	四三一
鄭、栾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討（尚志儒）	四三八
旂需考（陳初生）	四五二
簠器略說（劉 翔）	四五八
讀《金文編》札記（柯昌濟）	四六四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五屆年會開幕辭

胡厚宣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同志：

現在請允許我代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宣布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五屆年會正式開幕。

首先我們對原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理事容庚教授、于省吾教授、唐蘭教授、羅福頤先生、于豪亮先生先後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建議全體起立默哀一分鐘。全體起立。默哀。請坐下。

今天的大會，承陝西省各級領導同志、光臨指導，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這次會議，承陝西省各級領導、特別是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同志以及所內的其他不少同志大力支持籌備會議的一切。還有西安人民大廈的領導，提供我們良好的食宿和會議的場所，我們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自一九七八年在長春召開第一屆成立大會以來，今年已經是第七個年頭。由于同志們認為虽然是年會，但也不一定年年開，又因為等候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國際中國古文字研討會，我會不少同志要去參加，所以第四屆年會以後，一九八二和一九八三，停了兩年，到今年才開這第五屆年會。請同志們諒解。

我們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一九七八年在長春開第一屆會議時出席代表五十一人，列席的多是吉林大學的研究生。一九七九年在廣州開第二屆年會，出席代表六十二人，列席的多是中山大學的研究生。一九八〇年在成都開第三屆年會，出席代表七十四人，列席的五十八人，共一百三十二人。一九八一年在太原開第四屆年會，出席代表一百三十七人，列席的六十八人，共二百〇五人。第一屆論文三十三篇，第二屆論文五十五篇，第三屆論文七十八篇，第四屆論文一百二十三篇。這次第五屆年會，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到今天報到的已經有一百二十多人，論文已收到九十多篇。

可以看出，我们的会议在党的领导下，人员是愈来愈多，我们古文字学的队伍，是愈来愈壮大。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学者，风起云湧大量增加，已经逐渐形成了年轻化的局面。会议收到的论文，也是愈来愈丰富，质量愈来愈加有所提高。

通过会议相互交流，加强团结，空气愈来愈加活跃，会议会开得一次比一次更好。在当前科学发展新的形势下，正在逐渐走向开展新局面的高潮。

预祝大会胜利成功，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胡厚宣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第五屆年會紀要

大會秘書處

一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经过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充分准备，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在西安市人民大厦开幕。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厚宣先生主持，他首先感谢陕西省各级领导对会议的支持。他在历述了历届会议的情况以后说：「通过会议，相互交流，加强团结，空气愈来愈加活跃，会议一次比一次开得更好。」最后他「预祝大会胜利成功。」胡先生发言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先生接着发言。他向大会汇报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几年来筹备这次会议的经过。这次会议的召开，除省考古所的同志作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外，陕西省的党政领导、省内的兄弟单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此，石兴邦先生「代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表示衷心感谢。」最后，由大会秘书长赵诚先生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和大会有关事项。开幕式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二

二十七日下午开始大会讨论。首先讨论有关甲骨文研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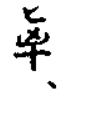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胡厚宣先生宣读了他的论文《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的再统计》。大约

五十年前胡先生曾在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十三期发表《甲骨文材料之统计》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很多甲骨材料未被统计进去。四十多年来胡先生一直注意甲骨材料统计工作，几次利用出国访问之便，核查国外所藏甲骨材料的数字。据胡先生统计，国内外共收藏甲骨一十五万四千六百零四片，其中国内（包括台湾省及香港地区）收藏一十二万七千九百零四片，国外共收藏二万六千七百片。这是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最精确的统计数字。胡先生在论文中详细列举了国内外公私收藏家所藏甲骨的具体数字。甲骨文材料是甲骨学及商代史研究的基础，胡先生的论文为甲骨学及商代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统计数字，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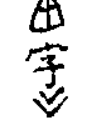
在甲骨学材料的整理校读方面，吉林大学历史系姚孝遂先生提出了论文《殷契粹编校读》。《殷契粹编》是郭沫若在三十年代编撰的一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部书将古文字的研究由孤立地考释文字，发展成为对卜辞时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探讨，在学术上有着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书在考释方面也有不少不当之处。姚先生的《校读》纠正了《粹编》的一些错误，这样就使更多的人能更加准确地引用《粹编》中材料，更有利于发挥《粹编》的作用。

四川大学历史系伍仕谦先生论文的题目是《怎样认识甲骨文》。他在文中强调了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和深入研读甲骨文材料及文献材料的重要性，认为：“不明经史，不读许、段，而考金石刻，而读甲骨文，那就是没有根底，舍本逐末。”他还批评了甲骨文考释中生形生义，任意想象的现象。

历组卜辞的年代问题是上一届古文字年会争论较多的问题。本届年会上，吉林大学历史系林沅先生的《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的研究》一文，是上届年会他的论文《小屯南地发掘与殷虚甲骨断代》的姐妹篇。他在文中分析了无名组卜辞中两种不同的“父丁”称谓，认为一种是祖甲称武丁，一组是武乙称康丁。前一组当属祖甲时代，甚至可能延至廪辛。后一组上起康丁，下至武乙。这样就解决了因为历组卜辞提前而造成的时间空白。他进一步指出，甲骨的断代首先有赖于精密的分类，而“科学分类的唯一标准是字体”。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发言支持林沅先生对甲骨先分类后断代的研究方法，并且提出对待甲骨也要象对待其它考古遗物一样，进行全面的标型学的研究，以便使甲骨断代更加科学、准确。

商代历史的研究，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先生的《商代卜辞中所见王与帝》指出，在商代除了商王朝国家首领称王外，其它一些方国的首领也可以称王，如王、王、王、王。王古等。他同意林沅先生的看法，认为王的本义为斧，王是在征战中形成的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帝原指上帝，但到祖庚时代，开始对直系先王称帝。这反映了武丁以后，商王权力加强，需要把直系先王与上帝结合，利用宗教巩固自己的统治的史实。《史记》把「五帝」都称为帝，把夏、商两朝的国家首领也称为帝，只是把周代国家首领称作王。高明先生根据他的分析，认为司马迁这种「先帝后王」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多子族卜辞是非王卜辞的主体部分，是我们研究商代氏族、社会的重要材料。四川大学历史系彭裕商同志的《多子族卜辞研究》对它的时代、性质、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种探讨将有利于对商代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

除了殷墟卜辞而外，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徐锡台先生的《试释周原卜辞中的字》和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连劭名同志的《读周原出土的甲骨刻辞》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周原卜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大会在二十八日上午转入对金文问题的讨论。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先生的《矢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通过对一些铜器铭文的分析，对矢国的姓氏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姜」是姜氏之女嫁于姜为君夫人。根据「矢王作姜尊」一语，他认为「矢王簋盖应为矢王所作以媵姜」。他们大约是父女。无论如何，矢王姓姜当无问题。张先生进而指出，矢王之所以称王，是因为他与周王朝并非同姓，在西周只有异姓诸侯才能称王，同姓不能称王。王国维的《古诸侯称王说》认为诸侯在其国内均可自称王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张先生发言后，宝鸡市文化局的尹盛平先生接着发言，指出从考古发掘上看，矢国确是姜姓，张先生的考释是正确的。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论文题目是《班簋续考》。班簋是一件断代有分歧的铜器。李先生详细分析了它的形制、花纹、字体、文饰，指出班簋是穆王前期之器。并且强调指出：「穆王时期金文，不少反映了经营徐淮地区的史实，班簋应推为其间最重要的一件」。在铭文的考释方面，李先生也

提出了一些特别的见解，如谓「东国瘠戎」为「乱戎」，使人读之有耳目一新之感。因为已故的于省吾先生在四十年前曾写过《毛伯班殷考》，所以李先生把自己的论文名为《班盨续考》，并以此致纪念于先生的不幸逝世。

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子黄尊，是一件从没有发表过的商末铜器。这件铜器铭文记载了「乙卯，子见，才太室，白□一，取琅九，出百牢。王商子黄尊用一，贝百朋」等史实。西安市文管会的王慎行等同志在《子黄尊铭文通释译论》一文中，公布了本器的拓本并对之作了解释。由于这件铜器铭文内容重要，所以中山大学的陈炜湛先生、孙稚维先生、历史系的李学勤先生、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伍仕谦先生、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夏绿先生、中华书局的赵诚先生都先后就这件铜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了这件铜器的重
要性，同时对铭文的释读也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

中山大学中文系孙稚维先生的《长田盂铭文汇释》，在汇集诸家说法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疑难字句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比何尊铭文中的字例，读「穆王蔑长田以逯井白」为「穆王蔑长田以逯井白」，并谓逯假弼。他的读法远较旧释通顺。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陈连庆先生的《晋姜鼎铭新释》，对宋代出土的《晋姜鼎》重新作了研究，指出鼎铭中的文侯是晋文侯不是晋文公，该器作于文侯后期，是一件春秋初年的标准器。

集中研究列国铜器的文章，有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李零同志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上》和湖北省博物馆刘彬徽同志的《湖北两周金文的国别和年代考述》。前者按年代先后整理了有铭文内证可以考证其王世或王年的楚国铜器；后者对湖北出土的两周铜器铭文（不包括传世品），分出国别，排出年代顺序，加以考述（本文只列曾、楚两国，其余诸国待补）。这种集中研究某一国别金文的作法，给学术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金文中地名的研究，是金文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由于许多有铭铜器有着明确的出土地点，使这项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在这次年会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辉同志的《西周畿内地名小记》、西安研究室卢连成同志的《虢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和陕西省文管会尚志儒同志的《郑、栾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讨》都利用铜器出土地点和考古发掘材料对金文中若干在陕西的地名进行考释，从而使其中的一

些地名的地望得到了确定。

金文中的月相问题，是上一届年会的重要议题，在本届年会中，文化部文化局文献研究室的刘启益先生和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又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宝鸡市博物馆的寇怀清先生也就月相问题作了发言。刘先生主张定点说，马先生庞先生主张四分说，双方都重申了各自的观点。由于月相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讨论一时还难得到一致的意见，但是这种讨论将有助于月相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金文资料的汇集发表是金文研究的基础，古文字学家对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的进展情况非常关心，为此王世民先生在会上专门做了题为《关于〈殷周金文集成〉》的发言，他说：考古所自五十年代初即开始收集金文资料，六三年开始在陈梦家先生的领导下编辑《殷周金文集成》。在「文革」中，编辑工作被迫中断，陈先生也不幸逝世。七九年又重新成立编辑组开展工作。《集成》拟收铜器一万件以上，数量比《三代吉金文存》和《商周金文录遗》的总和还多一倍。在拓本方面，承公私各方面的大力协助，选用了大量的精拓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拓本原大制版，全部用珂罗版印刷。共出十八册，约至九〇年出齐。王世民先生发言后，赵诚先生又对有关情况作了补充。

大会在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开始讨论战国文字及西汉古文字。

在战国铜器铭文研究方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曾宪通先生提出了《关于释读曾侯乙编钟铭文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他以整套编钟的实测音高为依据，运用编钟自身材料说明钟铭的本证法，结合古代乐律学的理论，将编钟铭文深入浅出地作了详细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不仅可以看到战国初期曾国乐律的概貌，而且对于如何通读这套编钟铭文也有极大的启发性。

在瓦陶文研究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郭子直先生向大会宣读了题为《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的论文。这件瓦书一九四八年出土于陕西鄠县，记载了秦惠文王四年（前三三四年），秦王封右庶长歇宗邑之事。由于时代的限制，这件瓦书长期没有受到重视。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学术界掌握了更多的秦代文物、制度的知识，从而得以认识到这件瓦书的价值。郭先生的考释简明精当，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山东省潍坊市群众艺术馆孙敬明同志的《齐陶新探》，对山东出土的陶文进行了分类分式的研究。

并且对一些关键性文字进行了考释。北京大学的郑超同志则以《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为题，对清代以来的陶文研究作了概述和评价。

在石刻研究方面：中山大学中文系陈炜湛先生在《诅楚文献疑》中，对宋代出土的《诅楚文》，从文字、情理、史实、词语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疑问，与会者对陈先生的论文进行了讨论，有的学者不同意陈先生的意见，有的则赞成对《诅楚文》的怀疑。

在简牍研究方面：文化部文物局文献研究室胡平生同志等人提供了阜阳汉简中的一条资料，说明四川青川秦墓出土木牍中的则字是一个实词，一则等于三十步。这就为研究秦代的亩制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们的论文因此名为《解读青川秦墓木牍的钥匙》。

在帛书研究方面：王辉同志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通过对帛书《易经》的校读，归纳了其中通假字的一些规律。

汉代的玺印和铜镜上的文字，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这次年会上，山西省文物局的张颌先生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先生就这方面的问题发了言。

张先生论文的题目是《成皋丞印跋》。成皋丞印是天津周叔弢先生旧藏的一枚汉印，皋字作，下从本。张先生根据这个字，结合《东观汉记》上的史料，指出在建武十七年（四一年）东汉政府曾统一整理过郡国印章的用字。这次整理是由皋字刻写混乱引起的，整理后的皋字下从本。成皋丞印中从本的皋字，是整理后所刻，为此次整理提供了物证。张先生用一方印章，论证了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周先生论文的题目是《湖南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汉代铜镜上的文字往往简略难认，周先生的文章通过对大量铜镜的排比，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由于铜镜上的文字往往可以和帛书、简牍上的文字互相参证，所以周先生对铜镜文字的分析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大会开始讨论最后一个议题：古文字的考释和古文字的语言学研究。

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的《关于𠂔字的解释》指出：《说文解字》的出字作，虽与金文出字作不合，但它却与金文中的𠂔字接近。出字上从𠂔与𠂔（之字）构形完全相同，其形似象艸木益滋上出，当为𠂔字初文。出字因有上达之义，故亦可训出，为《说文》所本。𠂔字因与「之」同源，故

金文中“𠄎”字亦可以训“之”。从而对“𠄎”上“𠄎”等一些铭文提出了新的解释。

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刘钊同志的《释“𠄎”》释“𠄎”为者。认为“𠄎”不是春、秋、载、世等时间词，而是系于时间词下的助词。卜辞中的“今𠄎”即“今者”，“来𠄎”即“来者”。𠄎字是卜辞中较难考释的文字之一，刘钊同志的考释把对这个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古文字的语言学研究方面，赵诚先生宣读了自己的论文《甲骨文虚辞探索》。他在文中分六类介绍了七十个虚词，并指出：虚词按照与实义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借音词与实义毫无关系（包括卜辞中的助词、语气词、代词和副词、连词、介词的大部分）。另一类多少与实义有一定联系，还多少能让人感到有一点实词的意味（包括卜辞中副词、连词、介词中的一小部分）。赵诚先生发言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姜可瑜同志和中山大学的陈炜湛先生即席发言，指出利用甲骨文研究古汉语语法的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陈永正同志的《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通过对十九个联结词的研究，指出了上古汉语中介词和连词的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

在大会期间，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扶风县博物馆、周原岐山两个文物保管所、周原西周房屋遗址和秦俑博物馆。在参观中，代表们看到了周原甲骨文、新出土的青铜器和其它珍贵文物，他们或者当场彼此交换意见，进行研究，或者摹写铭文、钩画器形，当作今后的参考资料。他们都认为此行不虚，对东道主的这种安排非常满意。

大会在九月二日晚间闭幕，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周雅光、陕西省副省长林季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丁蒙、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郭琦、省社科院顾问省考古学会会长何微、省考古学会顾问王修等到会祝贺。会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圆满结束。

九月三日起，代表们怀着满意的心情陆续离开古都西安。

《殷契粹編》校讀（節錄）

姚孝遂

弁言

郭沫若同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在哲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研究和實踐，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我們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文化遺產，為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郭沫若同志在古文字研究的各個領域，都有極深的造詣，是繼羅振玉、王國維之後，進一步將古文字的研究由孤立地考文釋字，發展成為與歷史學緊密地聯繫起來，綜合地探討這些古代銘刻所反映的當時人們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使古文字研究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郭沫若同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殷契粹編》（以下簡稱《粹》），是其古文字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專著之一。他在書中所闡述的論點以及其對這些原始資料的考釋，由於郭沫若同志在學術上所享有的權威，此書在學術界一直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有關學者在探討商史時，均作為權威性的結論廣事稱引，並經常以之作為立論的依據。

我們認為，以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學上的成就而言，他的許多精闢而獨到的論斷，已經得到充分的驗證是正確的，是可以引以為據的。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任何一部偉大的科學著作，都不免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任何一門科學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着人們認識的不斷進步與提高而逐漸向前發展的。尤其是像甲骨學這類新興的學科，更是如此。

郭沫若同志三十年代被迫流亡日本，由於環境和條件的局限，他還沒有來得及接觸到當時已經出土但未全部發表的甲骨資料，至於此後陸續見諸著錄的甲骨資料，他更是無從得知了。

新的資料的發現，有關學科的發展，都大大地豐富了甲骨學的內容，推動了甲骨學的進一步發展，改變了人們原有的認識和結論，這在科學研究工作中是經常的、不足為奇的現象。如果對具體問題不作具體分析，把歷史上的所有科學論斷不加區別地一律視為一成不變的真理，其本身就不是一個正確的科學態度。

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對《殷契粹編》作了校讀，對其中的某些考釋和結論，重新作了考察，目的僅僅是在於，使這部影響巨大的著作，能夠得到更加準確的引用，以發揮其更加巨大的影響。

以郭沫若同志在學術上的博大精深，作為後學，不敢妄加管窺蠡測，個人祇是懷着對郭沫若同志崇敬的心情，就某些具體的問題，作為學習的心得與體會，筆錄於次。

《粹》八

郭老考釋謂：「小宰即少宰，古者用三牲牛羊豕曰大宰，二牲羊豕曰少宰。卜辭小宰字均从羊作」。案：卜辭「宰」與「宰」均各有專指。「宰」為經過專門飼養以用作祭祀之牛，「宰」為經過專門飼養以用作祭祀之羊。牛羊豕曰大宰，羊豕曰小宰之說，不符合殷代之實際，此點已得到卜辭本身的充分證明（詳見《宰宰考辨》一文，《古文字研究》第九輯）。至於卜辭「大宰」與「大宰」，「小宰」與「小宰」均互見，或以「大宰」、「小宰」為誤刻，不可據。「凡卜辭小宰字均从羊」之說，斷非事實。

《粹》十二

郭老之釋讀為：

「庚午貞 龜大傳 于帝五丰臣，血：在祖乙宗卜」。

釋「血」非是，實乃「孚」字之殘。島邦男《綜類》所引錄此片均摹作「孚」是正確的。

《屯南》九三〇：「貞，其孚龜于帝五丰臣，于日告」

「孚龜」即「寧秋」，卜辭多見，乃祈禱豐收之祭。

《存》一、一一九二：「乙酉卜，貞，龜大集」辭雖殘缺，但可以看出與《粹》一二略同。

「龜大集于帝五丰臣」，即《屯南》「孚龜于帝五丰臣」之倒語。如釋「血」則不辭。且「血」與「孚」之形體於卜辭判然有別。

《粹》十三

「王又戌于帝五臣正佳亡雨」

郭老考釋謂「正佳義難解」，「疑是征伐佳尸之意」。

案此段卜辭當讀作「王又戌于帝五臣正，佳亡雨」。

「五臣正」於卜辭或稱「五丰臣」（《粹》十二），當即《左傳》昭十七年所說的「五工正」。

「佳」在此用作「惟」，卜辭「佳又雨」、「佳亡雨」習見。

《粹》七九、三九六

與《粹》七九相同的文例，卜辭多見。《摭續》六四有一段刻辭較為完整：

「丁未貞，其大知王自團，血用白猴九，下示汎牛，在父丁宗卜」。

而新出土《屯南》二七〇七，保存更為完整，其辭為：

①「：酃大知自團，其告于大乙，在父丁宗卜」；

②「：大知自團，其告于祖乙，在父丁宗卜」；

③「：其大知王自團，血用白猴九，下示汎牛，在大乙宗卜」。